

大学生写作能力差当何解

■本报见习记者 王之康

前段时间,由于在第二季《中国诗词大会》上的突出表现,获得总冠军的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高一女生武亦姝着实火了一把,用实力诠释了何为“腹有诗书气自华”,甚至有人称其“满足了对古代才女的全部幻想”。但翻开她的简历,可以看出她不仅是一个古典诗词爱好者,写作水平也不错——参加2015年首届“新闻晨报杯”上海市初中生作文实践活动,从3万余名中学生中脱颖而出,获得网络人气作品投票第一名。

日前,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要求学生具有与学段相适应的书面写作能力、朗读水平和书写能力等。可以肯定地说,尚在中学阶段的武亦姝已经达到了与其学段相适应的能力。那么,反观当今大学生,他们是否达到了这一要求?

写作较差的现实

2016年8月,湖北理工大学法学专业毕业的李玉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入了黄石市某人民法院。虽然至今已工作了半年时间,但是对于写司法文书这项本职工作,她却始终抱有抵触心理。“我学的是文科,大学时老师也教我们怎么写,提供模板供我们参考,但是练得太少,总觉得自己写出来的司法文书有些拖沓、主次不分。”李玉说。

有着类似烦恼的还有现供职于某烟草公司的韩蓓蓓。毕业不久的她一直在从事销售工作,平时也爱看看书、发发微信朋友圈,但纵使2016年发了整整100条朋友圈状态,却在年终时写不出1000字的工作总结,最终只能上网东拼西凑了一些资料,再以一顿饭为代价,请一位从事文字工作的朋友帮她代笔。

其实,不仅是这些进入职场的大学毕业生没有达到与其工作有相匹配的写作能力,很多大学生对于写作也有着同样的困惑。

比如,去年就有媒体报道,作为教育部博士论文抽检评审专家的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吉德,在评审完一篇关于数字时代摄影问题的博士论文后对其质量开了炮。此处暂且不论其观点如何,单看目录中的第三节标题——“综合近年来奥斯卡最佳摄影奖来分析这‘拆弹部队’和‘阿凡达’两部作品代表性的强的电影以及奥斯卡对数字时代电影摄影的审美倾向”。一个长达56字的标题,竟然充斥着语法错误、错别字等低级错误,很难让人相信这竟然出自一个博士生之手。

事后,陈吉德发出感叹:“随便堆砌几万个字,就能从‘博士生’摇身一变成‘博士’。这样的‘博士’到底价值几何?”同样地,我们也不禁产生疑问:大学生最基础的语言能力、写作能力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应试教育的遗祸

谈及大学生写作能力水平低的问题,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记者坦言,这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中之一便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应试教育导向。在中小学阶段的学习过程中,学生都以应试的方式对



待语文学学习,包括应试作文。“中国的学习在高考之前是以高考为目的的,高考结束之后,所有的意义也就结束了”。

对于熊丙奇的观点,南开大学语文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周志强深以为然。

“现在的中学语文教育过于模式化,语文写作也过于知识化、考点化。”周志强表示,语言之妙,奇妙无穷,尤其是妙在语文所达成的特殊感染效果。但当前的中学语文教育却并没有唤起学生对语言,尤其是对汉语千变万化、魅力无穷的感觉,导致语文或者说写作变成了一些死气沉沉的知识。“以致于有学生在进入大学后还对我说:‘我们都多大了,还要上大学语文课?’”

采访中,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卢晓东也表示,大学生写作能力差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小学阶段的写作教育没跟上。“在整个中小学阶段的语文设置上,我们对语法、字词的正确性方面要求非常高,比如字声要发音很准,写字的笔画不能出错,成语的解释只能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但是对写作的要求却并不高。”他说,在中小学的语文教育和课程设置中,对于平时阅读积累和写作,认识上有些偏差。

以2016年高考语文试题全国卷I为例,虽然作文写作在分值上要占到总分数的40%,但是在平时的写作教育上,教师们的一贯做法却是给学生们印发一些范文,要求学生阅读、背诵,考试时就以范文为参考,开头与结尾大量使用排比句以示工整,再灌入一些已经被大家用烂了的案例:勾践卧薪尝胆复国、司马迁忍辱负重写《史记》……而凡是这样的文章,都不会得太低的分数。

大学语文的困境

那么,在应试教育的结果已成定式的情况

下,该如何提升大学生的写作能力呢?在此,我们不妨首先看一下国外高校是如何做的。

比如在美国,几乎每一所本科院校都会开设写作课程。而且这门课程是一门必修课,学生不论语言水平如何、是否以英语为母语,都必须参加。事实上,国内也有一个与之类似并且与写作相关的课程——大学语文。但我们的大学语文课却似乎并不像美国的写作课那样办得风生水起。

此前,湖北省大学语文研究会曾做过一项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现状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全国91所高校参与的调查中,将大学语文列为必修课的仅有34.8%,课时也在逐渐减少,超过八成任课教师对大学语文的前景表示担忧。

对此,熊丙奇坦言,目前大学语文在很多学校都是选修课,只有一部分学生来选修,但这只是一方面,更严重的问题是,很多大学生选修大学语文课只是为了混学分,而不是真正为了提升自己的语言和写作能力。“这就是今天我们中国大学生的真实状况。”熊丙奇的语气有些无奈。

在周志强看来,大学语文课是否要成为必修课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这不仅是因为开设这样一门课程需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更因为在目前公共课负担过重的情况下,对很多大学生来说,再增加一门必修课确实是一个实际困难。

此外,在确定大学语文课是否要成为必修课之前,还有一项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要先明确这门课的定位。

“很多实例都告诉我们,在当前的中国大学体系里,大学生缺失了最基本的写作能力,但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管理者并没有注意到,母语也是需要教育的,它并不能根据自然环境而自然生长,所以没能首先在教育理念上确立母语教育的必要性。”周志强坦言,从这个层面来讲,

大学生村官的喜与忧

■本报实习生 赵鹏飞

不久前,在由中央电视台主办的《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中,毕业于世界名校耶鲁大学却选择回国担任大学生村官的“耶鲁哥”秦玥飞成功当选。这让人们在感动于他对祖国农村事业无限热爱的同时,也把目光聚焦到他所代表的大学生村官这一特殊群体。

或许是一种巧合,我国选派大学生赴农村工作的探索虽然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末,但全面铺开却是在2008年。算起来,今年正好是这一制度全面铺开的第十个年头。从这个角度上说,秦玥飞获评《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还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在近十年间,数以十万计的大学生奔赴农村,在陌生的土地上挥洒他们的青春和汗水。在那里,这些刚刚毕业的学生是怎样一种生活状态?对于自己的现状和未来,他们又有着怎样的期许?

农村工作无限营养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谈及当初选择做一名大学生村官的原因,在山东省庆云县东辛店镇北孔村任职的纪晓斌说道:“一是对家乡有感情,想为自己的家乡干点事情;同时,当时没有打算考研,想借此延缓一下就业压力。”

2015年7月从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毕业后,纪晓斌的村官工作就开始了,至今已有一年半。在这段时间里,他对这个工作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农民非常淳朴,也是很有智慧的。”

让纪晓斌印象深刻的是去年村里进行的环卫农村改造工作。那段时间正值七八月最热的天气,他和村干部在施工现场一待就是一整天,和村民一起干活,大家有说有笑,虽然辛苦,但也正是在那段时间里,他觉得自己“挺适应这份工作”的。

同样有这种感受的还有高潘,她从东北大学毕业后就到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华夏村社区任职了。

高潘做村官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去基层看看,改一改自己眼高手低的毛病。任职之初,

毕业于艺术设计专业的高潘觉得自己的专业和村官工作是完全不搭边的。但让她没想到的是,在农村做宣传册和设计好人榜、善行义举榜,却都能用到自己的专业知识。这种把大学里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工作中的感觉给了她持续的自信,也让她在农村接地气的工作过程中得到了锻炼。

“当时业余学过播音主持,到社区之后利用这个特长担任了理论志愿宣传者,后来成为丹东市理论志愿宣传者。2015年,区委宣传部带我参加了一个辽宁省关爱老人主题公益广告的拍摄,觉得挺开心的。”高潘说。

关于这份工作,他们得到的营养相似而又不同。

“基层工作很琐碎,这些琐碎的工作能让我学到无限的东西。”同样毕业于东北大学,在辽宁省营口鲅鱼圈熊岳镇大铁村担任村官的丁鹏这样说道,“工作两年后,爱上了农村生活,以后还是想去那里工作。当时我主要发起了村里的民舍改造,想让更多劳动力不出家门就能就业。虽然有些辛苦,但我掌握到很多能力,这些都是农村教给我的。”

身份尴尬不适应,期满何往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千头万绪的工作最后都会落实到村里,这样事无巨细的工作让大学生村官体会到成长的欣喜。然而,由于大学生村官没有编制,补贴相比其他职业也不高,期满后是续签还是选择考取其他工作,这一较为尴尬的身份让他们感到迷茫。

“村官遇到的压力之一是补贴比较低,一个月2000元左右,没有其他补贴,有些时候加班加点工作后还是挺疲劳的。”纪晓斌说,“不过因为山东省在2013年将选调生和大学生村官工作进行了合并,两年的村官工作没有出现大错误的话就可以顺利转成选调生身份,进入公务员体系,感觉还是相对有保障的,也有充分的心气去做些事。”

事实上,进入公务员系统是很多大学生村

官最切实,也是最希望找到的一条出路。

比如,夏位就曾担任过三年的村官,但现在已经考取了公务员。回忆起当时,夏位坦言:“毕业后想投身于公共事业,一开始没考上公务员,当时觉得村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现在看来,村官经历对于现在的工作也很有帮助。”

需要注意的是,几年前,大学生村官报考公务员时有一定的加分,但在夏位报考公务员的时候,这种“加分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公务员招考时会设定专门针对村官,也就是服务基层人员的岗位,其竞争范围比普通职位要小得多,也相当于一种优势,但这种优势相对于“加分”来说,已经有所减弱。

此前,陕西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曾针对大学生村官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有高达88.2%的大学生村官对“合同到期后的出路”最担心。

“在那种状态下,对未来的期许充满不确定性。三年期满后要么续签,要么干别的。很多时候,感觉长久性不强,因此很难当成一生的事业。”夏位感叹道。

长期扎根须自我完善和更多支持

正是出于对未来的这种迷茫,对于有志于长期扎根农村的村官来说,更需要国家的政策支持。

“上过大学的这一代年轻人,是很想为国家做一些事的。可是选择做村官,期满后考取其他

大学语文是不是必修课就不会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了。

至于大学语文课不被重视,则是因为课程的定位出了问题,把它当成一门国学素养课、文学欣赏课。“这样的话,大学语文课就变成了‘高四语文课’,成了高中语文的延伸,忽略了经典性语言能力的训练,从而也就丧失了大学语文的自主性和独有魅力,教法上也会出现很大问题。”周志强说。

势在必行的改革

在我国,直到上世纪末,大学语文都是很多学校的必修课。然而也就是从那时起,很多高校的语文课日渐式微。2013年更是被称为语文课的“寒冬”。那一年,以中国人民大学将语文课由“必修”改为“选修”为代表,大量的大学语文课被彻底“边缘化”。

对此,卢晓东表示,要想提升大学生的写作能力,首先就是要开设足够多的语文课程,同时建立一套完整的免修机制,因为每个学生的情况不同,写作能力也不同,要让他们根据自己的需求自主选择,如果已经达到了比较好的水平,就可以通过这个免修机制予以免修。

“此外,大学语文应该更多地转型到写作课,因为写作是目前大学生的一大短板,而且写作更加突出了语言作为一种工具的作用。”卢晓东说,学生要在做中学,要不断去写,同时老师要给学生修改,也可以同学之间相互修改,因为写作就是“写作—反馈—纠正—反馈”这样一个持续的过程。

如果说卢晓东的对策更偏向于对课程本身进行调整的话,熊丙奇则希望学校能进行一些更为长远的制度改革。

“至少从基础教育阶段就要改变应试教育,努力培养学生的兴趣和个性。”熊丙奇表示,在大学层面,则需要大学老师参与到学生学习的过程管理、过程评价、过程监督与过程淘汰中。很多学生并没有自主学习的习惯,所以他们学习任何一门课,老师都要规定完成一定的写作业,撰写与课程相关的论文,要求他们学会书面表达。

“如果每一门课都要求学生完成两到三篇课程论文,那么在毕业时,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很轻松地写出毕业论文。”熊丙奇说。

但是问题又来了,目前高校普遍存在教师只重科研不重教学的现象,自然不会自愿采用投入大量精力加强过程管理而没有太多物质回报的做法。“这才是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的要害所在。”熊丙奇说,大学不重视学生培养,因此学生也不重视自己的学习,进而导致人才培养整体质量不断下降。

在熊丙奇看来,现在的大学生写作能力差其实是早就注定的,它与大学生就业难、论文抄袭成风等现象并无二致。“原因是一样的,只是在不同的方面表现出来了,根源就在于中国教育的管理制度。”他说,如果不真正去推进高校核心改革,只就表象问题而论,那么将永远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部分姓名为化名)

中国大学评论

去年年底,曹德旺先生在美国建厂的行为以及关于“税负高”的言论让其一下子成为焦点人物。其实在此之前,曹德旺先生不仅作为成功企业家广为人知,其在公益慈善领域也曾获2010年“中国首善”称号,并在去年年初成为北京大学的名誉校董。值得一提的是,他在2011年因向某慈善基金会捐赠价值35.49亿元的股权而蝉联首善,但也引起了惊涛骇浪,因为这笔慈善捐赠产生了7亿多元的税负,这就产生了“不捐赠不纳税,巨额捐赠反而被课以巨额税款”的悖论。正是因为有了曹德旺先生的坚持,最终推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2016年发布了《关于公益股权捐赠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45号),使得股权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向前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

■王丹 李锋亮

大学基金会将迎来发展「黄金期」

其实,我国近几年已经有不少非货币化捐赠的案例,但相关法规的缺失导致无法通过税收减免等措施进行有效肯定、引导公众的多元资产捐赠意愿与行为,在客观上压制了社会民众捐赠用于教育等公益事业的热情。而早在1973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马丁·菲尔斯坦的研究就发现,给公益捐赠减税所带来的社会对公益事业捐赠的增加远远超过政府因减税所受的损失。这一研究结论为美国公益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提供了法理基础。目前,税收优惠是很多发达国家通用的促进公益事业发展的主要手段。

随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重大战略决策的确定,国务院在《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方案》中提出,高校要不断拓宽筹资渠道,积极吸引社会捐赠,多渠道汇聚资源,增强自我发展能力。而目前在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收入中,社会捐赠经费占比极低,远低于很多发达国家的比例。很多学者认为,缺乏足够税收优惠激励是导致我国高等教育捐赠收入过低的重要原因。去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提出了对包括高等教育捐赠在内的“一切慈善活动的税收优惠、资助补贴的促进措施:“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捐赠财产用于慈善活动的,依法享受税收优惠。企业慈善捐赠支出超过法律规定的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部分,允许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境外捐赠用于慈善活动的物资,依法减征或者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可见,《慈善法》为税收优惠政策提供了法理依据,不仅提出了税收减免三年抵扣,也明确慈善信托、物资捐赠等也应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基于税收法定原则,我们相信,税收主管部门一定会积极推动税法修订以鼓励多元化资产进入中国公益领域。与此同时,《慈善法》还规定:“慈善组织为实现财产保值、增值进行投资的,应当遵循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投资取得的收益应当全部用于慈善目的。”这也为我国大学基金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改革发展红利。

一系列国际上的经验显示,不能通过投资运作实现保值、增值的基金会很难长久地发挥效应。设立于1900年的诺贝尔奖与1903年的法国龚古尔文学奖距今都已一百多年的历史,两者在当时都是通过巨额遗产捐赠成立的,并且成立时间相差不到三年。然而时至今日,诺贝尔奖举世闻名,其奖金可以达到800万瑞典克朗(750万人民币左右);而龚古尔文学奖现在的奖金仅有10万欧元,不足100元人民币。两者之间一个主要差别在于诺贝尔基金会重视对捐赠资金进行投资运作,而龚古尔基金会则疏于对资金的保值与增值管理。

实际上,现在世界上运作良好的公益基金会不但拥有充足的资金,并且都在资金的保值、增值方面投入巨大的精力,成绩斐然。比如大学基金会的翘楚——耶鲁大学教育基金会在过去二十年平均获得了10%以上的投资收益,显著高于基准水平。耶鲁大学前校董、投资家查尔斯·艾里森曾指出,对于公益机构而言,卓越和平庸的差别在于对捐赠资金管理水平的差距。目前,美国大学的综合实力越强,其捐赠资金池就越丰厚,投资收益对学校的贡献也越大。

对我国而言,不仅《慈善法》作为公益慈善领域的基本法为大学基金会提供了发展机遇,财政配比资金进行捐赠奖励的政策更是大学基金会的催化剂。从2009年财政部、教育部对部属高校的捐赠收入提供财政配比资金开始,大学基金会从原有的百余家已经快速发展到400余家。近期,深圳市、浙江省、北京市等地区也相继出台财政配比政策以激励本地大学基金会更专业、规范地发展。

巴菲特在将个人310亿美元财富捐赠给比尔·盖茨基金会、60亿美元捐给其他慈善基金会的时候,曾经坚定地认为21世纪的前十年是“慈善黄金期”。在这上,我们预见中国大学基金会的黄金期也将马上开始,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目标的指引下,大学基金会具备了内外部快速发展的条件,随着《慈善法》的施行,“双一流”战略的确定,大学基金会将借此“东风”乘风破浪,并为未来我国“软实力”的彰显而积极助力。



大学生村官纪晓斌正在入户了解贫困村民的家庭情况。

工作是否有保障?是否有稳定收入,得到很好的认可?”丁鹏觉得,国家需要在政策上给予更多支持。

丁鹏的想法和纪晓斌不谋而合。“希望国家能让有志建设基层的大学生村官真正待在村里,多培训、参观学习,多进行一些创业上的引导。有些时候,对最新创业扶持政策不太了解。”纪晓斌说。

作为一个村官转变为公务员的过来人,夏位认为,国家可以把大学生村官的编制偏向事业编,在长久性问题上下功夫。

“如何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年轻人怎样把它当成事业而不是跳板?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夏位坦言,制度的制定和配套设施会让人感觉村官的工作是一个跳板。而且,目前农村的情况是,大部分需要使用电脑、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工作交给村官做,这可能使农村对村官产生依赖性。“除非保证村里每三年都有新的村官进来,否则三年期的政策或许不利于村官长期扎根基层,也不利于农村工作。”夏位说。